

第一章 总论

本书定名为《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确切地说，它以沙特阿拉伯、苏丹、土耳其、伊朗和埃及五国为例，着重探讨当代中东一个令人瞩目的问题，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关系。此外，本书最后两章的内容是关于犹太教正统派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世俗政权的关系。增添这方面内容，是为了使读者从中东地区另一个宗教的角度了解宗教与世俗的关系。

第一节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 “现代伊斯兰主义”

原教旨主义一词源于 19 世纪末叶兴起于美国，后又传遍世界许多地方的基督教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起在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伊斯兰运动（Islamic Movements），霎时间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乎席卷了伊斯兰世界的各个角落。其主体是各种公开合法的或半公开半合法的或秘密非法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它们力图运用一切手段，推翻现政府，把西方的帝国主义、东方的共产主义、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以及盛行于世的世俗主义视为伊斯兰教不共戴天的敌人而加以鞭撻和讨伐。在阿拉伯世界，“伊斯兰运动”又称“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振兴运动”或“伊斯兰觉醒运动”等等。应用

最广的莫过于“伊斯兰运动”这一术语。其成员自诩为愿以实际行动为伊斯兰事业而奋斗的“伊斯兰行动者”(Islamists^①)以区别于一般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由于伊斯兰运动的许多组织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看作头号敌人，猛烈抨击它们在世界各地推行的新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奉行的双重标准，一些西方国家感到若有芒刺在背，痛恨之极，遂把伊斯兰运动贬为“绿色危险”和继苏联之后“最危险的敌人”，并开动宣传机器，对它恣意中伤和诬蔑，把它描绘成一伙杀人越货的暴力恐怖分子，并冠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的名称。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自然是别有用心。因为伊斯兰运动的范围相当广，既包括众多的伊斯兰政治反对派组织，又涵盖许多官方伊斯兰和民间伊斯兰的活动。官方伊斯兰和民间伊斯兰的活动在许多国家并不带有政治色彩，更没有把某些国家作为伊斯兰的“敌对国”。即使那些伊斯兰政治反对派组织也不是铁板一块，在政治上有开明派、温和派、激进派和极端派之分。

正因如此，世界各地的不少穆斯林不喜欢使用“原教旨主义”这一术语，伊斯兰行动者则更加嫌弃这个词。近些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出于种种考虑也放弃使用“原教旨主义”一词，代之以特定

“Islamists”一词在阿拉伯文中的对义词是“Islamiyunna”。这个词是近年来新出现的，其确切含义尚没有定论。作者曾请教了几位阿拉伯友人（其中包括懂中文的），他们的解释也不尽相同。有的认为这个词等于“穆斯林”，二者没有区别；有的说这个词指那些自以为是“真正的穆斯林”，实际是一些抱有政治目的、带有政治偏见的人；有的称这个词指一些自诩为以实际行动——不论是卓越的智慧抑或暴力手段——为伊斯兰事业而奋斗的“伊斯兰行动者”，以区别于信仰伊斯兰教的一般穆斯林等等。我国学者则大多将这个词译为“伊斯兰主义者”。孰是孰非，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意义上的“伊斯兰主义”(Islamism)。我国有的学者把伊斯兰主义分为“传统伊斯兰主义”(又称“近代伊斯兰主义”)和“现代伊斯兰主义”。前者指具有复古主义倾向的近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后者指以“托古”为名行“改制”之实的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

我们以为“伊斯兰主义”一词应是各种伊斯兰思潮的总称,包括伊斯兰传统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现代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伊斯兰世俗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等,不一而足,而不囿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特定意义上的“伊斯兰主义”、“传统伊斯兰主义”或“现代伊斯兰主义”取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是可以理解的。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词已被精确地译成阿拉伯文。其阿文译名(Usuliyah)与伊斯兰教原理学(Usul al-Din)中的“原理”一词同属一个词根(Asl),意即“根本”、“根源”。此词已为不少阿拉伯人所接受,因而常见诸于学术著作和报刊杂志。他们使用这词的用意迥然不同,有的借此贬抑伊斯兰政治反对派别,有的则不然,认为没有其他词能比它更确切地描述当今的伊斯兰觉醒、复兴或振兴了。^①我国多数学者亦已习惯于使用这个词,并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他们从不怀有某些西方学者的恶意。在他们看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绝不等同于内容广泛的伊斯兰运动或伊斯兰复兴运动,而是局限于其中一些主张以《古兰经》和圣训(简称经训)为本,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实施沙里亚法(即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的政权和组织。鉴于目前在阿文中尚无一个确切的词来概括这些政权和组织,我们无法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选择某一个词,而排斥另一个词。在此情况下,只能兼收并蓄,让“伊斯兰主

哈·桑·哈奈菲:《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埃及的宗教与革命》系列丛书第6册,开罗1989年版,第5页。

义“传统伊斯兰主义”或“现代伊斯兰主义”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同义词在本书个别章节中出现，以尊重作者的意愿。

世俗主义 (Secularism) 又称现世主义或非宗教主义 是来世主义一词的对义词。众所周知 在中世纪的西欧 以罗马教皇为代表的基督教会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势力坐大，有权任免国王和征收苛税 而且垄断了意识形态 把政治、法律、哲学、教育和道德都置于神权的控制之下 神本主义思想风靡一时 人们离世守贞 寄希望于来世和《圣经》中的“千年王国”。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与教会的矛盾日趋加剧，它通过宗教改革运动力图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摆脱教会的控制和束缚。而德国农民战争又使封建制度和天主教会受到沉重打击。世俗主义旋即应运而生。这是一种与神权统治或教会统治相对立的政治学说。世俗化 (Secularization) 是世俗主义思想付诸实施的行为过程。从近代西欧基督教社会的发展来看 世俗主义和世俗化的基本内容相一致 提倡科学和理性 要求教会与国家相分离 教会与司法相分离 教会与民众教育相分离 号召人们放弃脱尘绝俗的思想 回到世俗的以人为本的现世中去。它们不反对宗教信仰 但坚持信仰自由 允许人们自由选择自己的世界观，竭力使宗教成为个人信仰和个人私事。我们不妨把以上述“三个分离”为主要内容的世俗主义称为狭义的世俗主义 而将以狭义的世俗主义为其基本内容 同时涵盖包括世俗政权、政党、制度、思想、文化等在内的世俗主义叫做广义的世俗主义。

第二节 近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兴起的原因

近代以来特别是土耳其凯末尔革命之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极端仇视世俗主义 把它比喻为“毒蛇”和“癌症”声称世俗主义在伊斯兰世界的传播旨在摧毁伊斯兰教 破坏它的支柱 窒息它的声音。当代埃及著名伊斯兰思想家优素福·盖尔达维宣称“，真正的伊斯兰教与真正的世俗主义不可能共处。”^① 他承认世俗主义在西方兴起有其宗教、思想、心理、历史和现实原因 同时又断定它只适合于基督教社会 而不适用于伊斯兰教社会。在他看来 伊斯兰教在对待世俗主义方面同基督教有天壤之别。首先，基督教本身包含着政教分离的思想 耶稣曾说“，凯撒的物当归凯撒 上帝的物当归上帝”。而伊斯兰教所信奉的安拉是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它反对分权 相信凯撒只是安拉的奴仆。其次 基督教只是精神和道德的训诫，缺乏处置日常事务的详尽律法。而伊斯兰教既是信仰 又是律法 为人类制定了从生到死的生活准则。再次 基督教社会存在双重政权 即以教皇为代表的宗教政权和以国王、总统为首的世俗政权。若实行政教分离，宗教在强有力的教会庇护下能继续存在。而伊斯兰教没有教阶和教会，一旦实行政教分离 将失去生存的依托。最后 基督教教会史因充满着反对科学、反对新思维和反对自由的史实而令人愤懑。因此 广大人民憎恨教会 摆脱教皇的直接统治 是理所当然的。而伊斯兰史则完全不同 没有这种逆潮流而动的可耻记录。

那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关系果真像盖尔达维所说的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还是处于既对立又相容，既排斥又渗透的状态 近代西欧基督教社会以“三个分离”为标志的世俗化进程是否适用于东方社会特别是宗教思想根深蒂固的伊斯兰世界？廓清这些问题对进一步认识当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和运

① 优素福·盖尔达维：《伊斯兰教与世俗主义的对峙》开罗 1987 年版，第 111 页。

动的发展趋势至关重要。但国内外学者迄今很少有人涉及，更不用说有深入的研究和定见了。本书试图以近代以来沙特阿拉伯、苏丹、土耳其、伊朗和埃及五国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和实践为例，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关系做尝试性的探索。

世俗化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变化过程，是同促进经济飞跃发展的工业化相伴而生的。工业化不仅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原动力，而且开创了一个理性化的时代。正如韦伯所说，工业化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祛除巫魅的时代”。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随之渐渐摆脱了宗教的羁绊，进入更富有理性和科学思维的年代。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以“三个分离”为标志的世俗化不仅是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及其向现代化迈进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以“三个分离”为主要内容的世俗化改革的成功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在短短的 15 年左右时间内，土耳其社会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废除了苏丹制和哈里发制，建立了代议制共和国，经济高速增长，一跃成为当时伊斯兰世界唯一生机勃勃的国家，被列为当时世界工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妇女在法律上破天荒地获得了同男子相同的政治地位；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明显改善。这一切在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东方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成了一面旗帜，鼓舞了几代人，许多国家竞相效仿。阿富汗的阿曼努拉汗（1919~1929年在位）改革、伊朗的礼萨·汗（1925~1941年在位）改革以及二三十年代起世俗思潮在阿拉伯东方的广泛传播，无疑是受了凯末尔世俗化改革的直接影响。继起的许多民族主义领袖，如埃及的纳赛尔和萨达特、巴基斯坦的真纳、突尼斯的布尔吉巴等等，他们在争取民族独立、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事业中无不受到凯末尔思想不同程度的鼓舞。突尼斯前总统布尔吉巴说道：“阿塔

图尔克也是我国的领导人 我个人追随他的道路。”

二战前后 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相继获得了独立 进入了经济建设时期。不论这些国家采取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 应该说都取得了不同的进步 遇到了不同的挫折。原教旨主义思想家把这些困难和问题存在归咎于当局推行世俗化，背离了伊斯兰教原旨教义的缘故。他们猛烈攻击中东地区世俗化的倡导者凯末尔，说他埋葬了伊斯兰教，罪不容诛。他们把继礼萨·汗的改革和巴列维的‘白色革命’之后在伊朗爆发的伊斯兰革命说成是西方的世俗化进程不适合于东方社会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反证。

世俗化在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和礼萨·汗时期的伊朗导致两种不同的后果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 土耳其信奉逊尼派 官方伊斯兰实际处于苏丹王权的严格控制之下，教职人员早就成为政府官员的一部分 即使是作为民间伊斯兰代表的各种教团 它们同王权的关系也较为密切。凯末尔推行政教分离的出发点不是要使伊斯兰教脱离政府的监督而获得某种独立 相反地 是要进一步加强世俗政权对宗教的控制。伊朗自 16世纪起便将什叶派定为国教。什叶派长期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并以小伙伴的身份处理同国王的关系。礼萨·汗的改革损害了什叶派的权益 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它相对独立的地位。其次 伊朗拥有像库姆·马什哈德那样的什叶派宗教圣地，客观上为动员宗教力量对抗世俗化进程提供了方便条件。这样的圣地在土耳其却不存在。再次，两国推行世俗化改革的主要据点都在大城市，但大城市在两国所起的作用明显有别。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发展几乎与现代工业资本的发展同步 已具有较鲜明的世俗文化意识 更何况伊斯坦布尔已成为世界性的大都会 其经济文化的辐射能量对世俗化进程的作用不容低估。伊朗则没有这样性质的大都市。及至70年代初 作为伊斯

兰教在城市的传统势力基地的“巴札”行会在首都德黑兰仍享有很大势力 其成员连同家属在内几乎占全市人口的一半 在其他城市这个比例还要高些。^① 这意味着，伊朗的都市尚未成为推动世俗化改革的可靠据点。最后，凯末尔对世俗化改革有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 即凯末尔主义 其核心是顺应世界潮流的共和主义和符合占全国人口 80% 的土耳其族人愿望的民族主义。凯末尔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虽无法取代伊斯兰教信仰 但它对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影响深远。而礼萨·汗在这方面无法望凯末尔的项背，仅仅是凯末尔改革次要方面的摹仿者。他企图倡导波斯民族主义，结果使占全国人口半数以上的非波斯民族惊恐不安。什叶派仍然是维护伊朗统一不可或缺的因素。

自六七十年代之交起，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风起云涌 先后推翻了伊朗、苏丹和阿富汗三国的世俗政权 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原教旨主义政权，并对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世俗政权构成了不同程度的威胁。这一事实不能作为伊斯兰国家排拒世俗化的理论依据。有的学者把伴随世俗化进程出现的宗教复兴和宗教创新两种现象称之为世俗化进程“自我限制的特征”，^② 不无道理。

关于伊斯兰史上几乎每隔一百年都会出现一次大规模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 恩格斯曾作了精辟分析 指出：“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律条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因人，则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

^① JI. E. 斯克里亚罗夫：《60～80年代的伊朗 传统主义反对当代性》，莫斯科 1993年版 第 176页。

高师宁：《关于世俗化问题》，《世界宗教文化》，1995年第 4期。

导下去惩罚背教者 恢复对礼仪、对真正信仰的尊重 并把背教者的财富作为给自己的奖赏而收归己有。自然 过了一百年 他们又处于这些背教者所处的同样地位 又需要来一次信仰净化 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又从头演起……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① 近现代中东地区的许多伊斯兰运动说明恩格斯的这一科学论断是无可辩驳的。如 1881 年苏丹爆发的马赫迪起义，其主要原因是反对外来殖民者对苏丹人民的残酷经济压榨和政治迫害。1899 年马赫迪国家被灭，除了英国以埃及的名义派兵镇压以外，其内部原因是以阿卜杜拉为代表的新权贵追求物质享受 独揽大权 任人惟亲 回复到原先“背教者所处的同样地位”。这一蜕变过程前后仅 18 年 而不是百年。20 世纪 70 年代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席卷了整个中东地区，爆发了震惊世界的霍梅尼革命 发生了巴希尔政变 阿富汗也建立了原教旨主义政权 在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约旦、沙特阿拉伯、巴勒斯坦等地发生了一系列暴力恐怖流血事件。这些运动和事件大多是经济原因引起的。1979 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归根结底是由于巴列维实行专制统治 聚敛财富 在进行“白色革命”时 好大喜功，盲目投资 导致经济比例失调 两极分化加剧 社会矛盾激化使然。1989 年巴希尔在同全国伊斯兰阵线共同策划下，政变成功，根本原因是苏丹长期陷入内战、贫困、落后的困境 及至政变时已成为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七八十年代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发展壮大同埃及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密不可分。但是，大千世界千变万化，不能将世上发生的同一类事件统统归于同一原因。18 世纪中的瓦哈比运动便带有浓厚的复古主义色彩，目的在于纯洁伊斯兰教，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 第 526 页。

除却异端邪说；结束酋长国和部落间的无端仇杀以及土耳其的异族统治。1928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成立则是对流行于埃及社会的世俗思潮特别是以法老文化为基础的埃及民族主义做出的逆反性的回应。至于二战后的土耳其教团的重新崛起三个伊斯兰政党的相继建立以及秘密极端组织的出现除经济原因外也与世俗政党及领导人的容忍和鼓励，倡导土耳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融合论有关。

第三节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内容的嬗变

一般认为，伊斯兰教的原旨教义是，宗教上严格遵循一神论，反对多神论、偶像崇拜和各种异端邪说恢复经、训的真谛和先辈们的优良传统，回到最初的伊斯兰教中去。政治上号召推翻那些偏离‘安拉正道’的不义的统治者重建以经、训为本实施沙里亚法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恢复伊斯兰教倡导的社会公正和俭朴圣洁的生活方式；强调圣战是穆斯林应尽的宗教功课之一。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世俗主义思潮的涌入现代伊斯兰原旨教义中又增添了一些政治内容即从宗教立场出发反对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用伊斯兰教的包容性来抗拒西方的世俗精神文明，但一般不排斥其物质文明。

由于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而相应地发生变化，原教旨主义思想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也不例外，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纵观近现代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不难发现这些运动信奉的原旨教义有相同之处但由于种种原因其理论又有不同之点即便同一教义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其内涵亦不尽相同至于其实践更是大相径庭，千差万别。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国别的差异。各国有自己的国情，只有按国情办事，方能成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中不少人能从实践和失败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慢慢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一般能根据不同的国情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方针，而且依照国情的变化，逐渐调整自己的对策。例如宣教和圣战本是伊斯兰扩张势力双管齐下的手段。但圣战被许多原教旨主义者尊为夺取政权和向外扩张的重要或惟一途径。18、19 世纪之交的瓦哈比运动和 19 世纪下叶的马赫迪运动主要是通过圣战得以建立第一沙特王国和马赫迪国家的。不仅如此，沙特家族还派兵越过阿拉伯半岛，进入两河流域，捣毁了什叶派伊玛目侯赛因在伊拉克中部卡尔巴拉的圣陵，同时又长驱直入，逼近叙利亚的首府大马士革。马赫迪国家在解放苏丹后不久也出兵攻打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因为当时这两个国家的统治者都缺乏国界的概念，在狂热的宗教情绪驱使下，企图效仿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立志向所有“卡菲尔”^①宣战，把圣战理解为无节制的武力扩张。沙特家族第二次和第三次立国时，虽也仰仗圣战，但变得富有理性，把圣战使命限于半岛的统一。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成立后，摒弃了圣战口号，力图通过宣教和石油美元争当伊斯兰世界的盟主。沙特王室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密切关系。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哈桑·图拉比为首的苏丹伊斯兰宪章阵线（其前身是苏丹穆斯林兄弟会，1985 年更名为全国伊斯兰阵线）也不同于历史上的马赫迪运动，不再诉诸暴力和圣战，而是侧重在军队中寻找代理人，同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尼迈里军政府和解和合作，与志同道合的巴希尔将军密谋合作发动政变。同时

阿拉伯文 *kafr* 的音译，意为“掩盖”“抹煞”。原指抹煞安拉的恩惠，忘恩负义的不信者。后成为穆斯林对非伊斯兰教徒的统称，即“异教徒”“邪教徒”“不信教者”，带有贬义。

注意深入群众 扎根社会 公开与秘密活动相结合 以便在发生不测事件时能随机应变，保存实力。但巴希尔—图拉比政权对不同信仰的南方黑人却无情地发起圣战 进行征讨。此外 它还在喀土穆召开阿拉伯伊斯兰人民大会，借以推动中东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哈桑·班纳时期（1928~1948年 处于合法地位 注重布道和训诫 但立足于圣战，遂相继建立了公开的准军事组织远足队、童子军和分遣队 不久又成立了全副武装的“秘密系统”伺机夺权 并积极投入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的巴勒斯坦战争。1948年底兄弟会被取缔后，其领导人开始改变斗争策略 认为“和平演变”胜过武装圣战 遂谴责武装圣战、暴力恐怖活动、军人政变和群众运动 坚持不懈地进行宣教和教育 积极参加议会斗争 开展各种宗教、社会和文化活动 以争取民心 获取政权。它一如既往地仇视犹太复国主义 反对和谈、承认以色列和同它关系正常化 但又不得不面对现实 承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解放巴勒斯坦的任何愿望仍然似海市蜃楼”，因此不敢贸然卷入发生在以色列境内的自杀性流血事件中去，尽管它在感情上颇为同情。土耳其的原教旨主义势力主要是一些重要教团。这些教团往往通过支持执政的世俗保守政党，分沾一些议席 换得开展活动的便利条件。活跃于政坛的繁荣党（其前身先后为民族秩序党和救国党）虽拥有相当多的原教旨主义成员和追随者，但很难断定它的原教旨属性。它始终把积极参加议会竞选活动作为扩大其影响的重要手段。伊朗的霍梅尼革命与众不同 它虽带有强烈的伊斯兰色彩 却没有号召信徒发起圣战 而是利用各阶层人民对巴列维国王的极度不满，发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辅之以对军队的分化瓦解 最终迫使国王仓皇出逃。革命成功后 毛拉政权置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于不顾 从狂热的宗教立场出发 公然提出“输出革命”。但在遭到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

公众舆论的强烈谴责下，当局有所收敛。

2. 时代的差异。上述事实说明各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和采取的组织方式截然不同，有武装圣战、支持军人政变、群众运动、宣教和教育、议会斗争等等手段。对于国内外的“伊斯兰敌人”也采取军事讨伐、武力镇压、输出革命、全面抵制和相互合作等不同措施。但总的说来，随着时代的变迁，除了名目繁多的秘密极端组织和一些公开或半公开的组织继续热衷于武装圣战和暴力恐怖活动以外，多数原教旨主义政权和组织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调整了策略，把无节制的圣战改为有节制的圣战，而且逐渐把斗争重心由武装圣战转移到和平合法的斗争上来。这一发展趋势有目共睹，毋庸赘言。

原教旨主义思想因时代的变迁而发展的最突出表现是伊斯兰政治体制概念的演变。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例，在班纳时期它再三申明兄弟会的首要任务是恢复传统的哈里发制和“舒拉制”^①，而对世俗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立场。20世纪下半期的兄弟会则对世俗政治制度作了前所未有的回应。诚然，它敬重哈里发制和舒拉制，但认识到恢复哈里发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舒拉制没有定式，可以根据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制定新的形式。它把西方代议制视为当代舒拉制的理想实现形式，把进入议会作为和平合法斗争的重要手段。既然如此，它势必要修正其对西方代议制的民主自由、“主权在民”和世俗政党的传统偏见。

关于民主自由，班纳认为它违背天命，使人类享有立法的绝对权利和拥有不受宗教束缚的绝对自由，故而加以鄙弃。20世纪下半期的兄弟会却声称民主的最高涵义是让人人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

阿拉伯文 Shura 的音译，意即“协商”、“咨询”。舒拉制即协商制。

发挥，自由的概念是给不同信仰者以说话的权利。其著名思想家穆罕默德·加札利甚至赞叹道：“伊斯兰民主思想在诸如英国这样的国家已经实现。”

关于“主权在民”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按伊斯兰原旨教义规定 哈里发由舒拉会议推选产生 臣民在向哈里发宣誓效忠后须绝对服从。班纳在兄弟会内部实行个人专断，要求全体成员绝对服从，对不同意见者加以肉体折磨。20 世纪下半期的兄弟会却不然，宣扬真主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权利和义务方面一律平等 穆斯林乌玛有权监督、责问、清算乃至废黜统治者。

关于世俗政党 班纳全盘否定 认为“在伊斯兰教中不存在党派主义”因为它分裂了伊斯兰民族。80 年代前 兄弟会多数成员仍然坚持兄弟会不能因要求恢复合法地位而改变性质，成为政党。但自 1986 年起兄弟会多次提出建党申请，同时承认多党制的合理性 认为它对于反抗暴政 使当局改邪归正或取而代之 都是不可或缺的。

可见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虽然是一种保守的神学思潮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虽然是一种政治、宗教、社会运动 它们的变化不是在短时间内所能觉察到的，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到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加以考察，又可以发现它们的演变是彰明较著的。

3. 处境的差异。被原教旨主义者尊为“殉道士”和“楷模”的埃及原教旨主义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卜就因为身陷囹圄十载 遭受种种羞辱和迫害而成为极端派的代表人物。他在《路标》一书中提出了“主权归主论”即阴阳两世的一切权力归真主所有 任何政党和凡人无权自行立法，借以否定现世一切世俗政权。他认为现行所有社会 包括所谓的穆斯林社会 都是蒙昧主义社会 必须主动出击 向这些社会发起进攻性的圣战。库特卜的思想不胫而走 为中东地区许多家境贫寒、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对当局不满 特别是

受到当局迫害的青年所接受。他的代表作《路标》成了许多敌视当局的原教旨主义者分析当今社会的思想武器和众多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行动指南。

如埃及的秘密极端组织穆罕默德青年集团、赎罪和迁徙集团、圣战集团和伊斯兰集团等等 它们的思想较之处于半合法、半公开地位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更加激进和极端。它们竭力鼓吹圣战，制造一系列暗杀、纵火、抢劫、爆炸等暴力恐怖事件 不仅与当权的军政要员为敌 而且借口“允许用暴力改变人们的恶行”把矛头指向本国的基督徒、苏非派和普通穆斯林。这些秘密极端组织反对议会斗争 攻击兄弟会是“软骨头和胆小鬼”参加议会斗争无异于赋予当局以合法性。它们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和价值观切齿痛恨 申斥自由民主是以物配主 对人的神化 授予人以立法权 并要求人们顺从统治者“主权在民”和成文法意在篡夺真主至高无上的权力，与伊斯兰原旨教义背道而驰。它们认为政党分两类：一类是为建立伊斯兰国家而战斗的“真主党”另一类是现有的一切世俗政党 其信仰和纲领都有悖于伊斯兰教 属“魔鬼党”。谁加入这些政党 便成了卡菲尔。

在富裕的沙特阿拉伯王国，反政府的原教旨主义势力也悄然兴起。1979年11月20日（回历15世纪的第一天）300多名极端分子武装占领麦加大寺便是突出一例。他们的纲领比被公认为温和的原教旨主义沙特政权要极端得多。指摘沙特王国的现代化政策及其实施的社会变革，抨击沙特统治者在宗教上的松弛和道德上的堕落 断定沙特的乌里玛已被金钱收买 号召人们捍卫伊斯兰教的纯洁性 在政治上废除对沙特家族的效忠 重建理想中的哈里发国。

在世俗势力强大并受宪法保障的土耳其，伊斯兰政党显然比主要教团温和，而这些教团又比秘密极端组织温和得多。伊斯兰

政党的目标主要是促进国家的伊斯兰化，发挥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的主导作用。教团有浓厚的怀旧感情，向往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的幸福时代 怀念奥斯曼帝国的辉煌时期 企盼通过和平合法的手段，建立一个在土耳其领导下的伊斯兰国家联合体。秘密极端组织形形色色 影响有限 有的实际是外国同名组织的延伸。如伊斯兰解放党系约旦同名组织的分支机构 主张发动起义 改变本国现行的世俗制度 联合所有伊斯兰国家 在土耳其旗帜下 重建一个由哈里发领导的统一的伊斯兰共和国，并为此制定了一部宪法。它要求对违反沙里亚法者严惩不贷 处死叛教者 监禁不做祈祷的人 鞭笞饮酒者。

可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和组织由于在各国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不同，其思想和主张有明显差别。非法秘密组织要比合法政权和公开合法组织以及半公开半合法组织极端得多；合法政权和公开合法组织一般说来要比半公开半合法组织温和些，但也有相反的，当代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主张总的说来要比某些合法政权开明些。同样处于公开合法地位的政权和组织 其政纲也不尽相同 有的差异甚大。这种现象不足为奇 是由不同的国情所决定的。

4. 理论与实践的差异。对于原教旨主义当政者来说，主要表现在执政前后有别，执政期间前后有别。人们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政策的变化中可见一斑。

霍梅尼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缔造者。他把革命前伊朗社会存在的一切弊病归罪于国王实行的世俗化政策，因此革命后针锋相对 提出‘不要东方 不要西方 只要伊斯兰’的口号 并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进行了非世俗化。这个口号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外交诸多方面，其终极目标是清除世俗主义，使伊朗彻底伊斯兰化。反观伊朗革命后近 20 年的历史 非世俗化确实进展神速 但要全方位地肃清世俗主义影响是不可能的 相反地 在 80 年代中期以

后世俗主义成分又有所增长。这种趋势表现在多方面。

关于政体，霍梅尼的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长期以来，他痛恨伊朗国王，称他们为暴君，但并不完全反对君主制，认为有一个哪怕是没效率的甚至是有害的政府总比没有政府强，建议乌里玛要把批评政府与忠告和帮助政府结合起来。1971年他在流亡国外期间宣布伊斯兰教是根本反对君主制的，必须建立伊斯兰政府。至于伊斯兰政府究竟建立在麦地那乌玛制、四大哈里发制抑或倭马亚王朝之后名义上的哈里发制或苏丹制、实质上的君主制政体之上，霍梅尼未作答复。直至1978年他才明确指出要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伊朗原教旨主义先驱阿亚图拉法兹拉赫·努里曾鄙视立宪运动，称宪法为“一本错误的书”，立宪会议是多余的，因为《古兰经》已包容了治理国家的一切法律。霍梅尼不因循守旧，在建立共和国后不久便成立议会，行使立法职能，颁布宪法，规定真主赐予人民对自己社会命运的主导权，创建执政的伊斯兰共和党，同时承认经过审查批准的党派和组织的存在。

经济上，霍梅尼在革命初期多次说明，伊斯兰革命主要不是为了要在物质生活水准上有多大提高，而是要传播伊斯兰精神价值，实现社会公正。为此，当局没收国王及其支持者的财产，控制了有关国家经济命脉的700家大企业；议会虽以土改有悖于伊斯兰教义为由，收回了“白色革命”时分给农民的宗教地产，却承认农民拥有在革命初期抢占外逃地主土地（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5%）的所有权，实行产品定价、财政补贴和食品配给，普遍开征传统的伍一税和天课税，取消银行利息，将存款分为无息短期存款和长期投资存款两类，设立各种慈善基金会，向穷人和殉难者家属发放抚恤金和津贴，颁布《伊斯兰消费法》，崇尚节俭，反对浪费，严格限制进口奢侈品。

这些措施在一段时间内有利于缓解社会两极分化，使平民